

上午我接到电话,得知于光远同志今天(9月26日)早上驾鹤西去的噩耗。我热泪盈眶,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哀思。国家失去了一位学识深厚、智慧充盈的反伪科学领军人。我又失去一位尊敬的前辈、一位亲近的师长。

一位反伪科学的领军人

——哀悼于光远同志
陈祖甲

我与光远同志在等级上距离比较大,他是高官,我曾经是一名小记者。但我们关系是亲密的,人格是平等的,故而我一直称他为光远同志,即便在当面也如此。在反伪科学问题上,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,为了国家的科学发展、弘扬科学精神、科学知识、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,让公众有更高的分辨能力,他领着我们不留情面地进行揭露和批评。



在读大学时,我只知道光远同志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,有建树,有名气,但我不知道他曾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他作为恩格斯《自然辩证法》一书的最早翻译者、国家科委副主任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,亲自出马,带领一些同志反对伪科学。在这个时期,我才认识光远同志。那时伪科学泛滥,我听过光远同志的几次报告,并作了报道,我才知道他受“五四”的影响,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反对科学界混杂“灵学”,1949年时已经得知国外有“超感知觉”(ESP)和“心灵制动”(PK),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出现的“人体特异功能”。我从报告中得知他对这些问题有较深的研究,批评有理有据。

从光远同志批评伪科学的实践中,可以看到他具有较深的科学精神。特异功能倡导者曾以“眼见为实”为理由,向他挑战,要他观看“特异功能人”的表演。他坚决不去。他明白科学试验是不靠看表演的,并明确地说:“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,要对你们的一切表演做一番科学检验,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种验证,但不愿以一个魔术观众的身份被你们利用。”(见《我是于光远》一书)当然,在几位香港友人的邀请下,

他感情难却,决定向当时那个红极一时的特异功能“大师”挑战,并作了充分的科学准备。那个“大师”听说他要到场,吓得不敢出场,同香港朋友失约。由此,光远同志被诬为有“佛眼通”。我也有同样的经历。因为我戳穿“特异功能人”的骗术,使他们失败,那些人诬称我有“特异功能”。那种倒打一耙的逻辑叫我特别反感。

光远同志作为高层领导,却生活简朴,待人平和,没有架子。他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处平房里,光线并不好,陈设简单,饮食也简单。

有一次,他作报告,我准备作报道。但是,我的住处离报告会会场比较远,而离光远同志的住地还近些。我请求搭他的专车去,他同意了。那天早上七点不到,我就赶到他家里,他刚起床。洗漱完后,我看他吃早餐,仅一杯牛奶、一个鸡蛋、两片面包而已。他匆匆忙忙吃完后,抹抹嘴,我们就出发了。到了会场,我看他没有带秘书,拄着拐杖,想去搀扶一下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,可他却伸手把我推开。

光远同志学术造诣深厚,写作勤快,著作等身。我的书柜里收藏着他近二十本涉及经济学、自然哲学、文学方面的著作,大多是他送我的。

在他九十岁时,为了表示敬仰,我涂了几句算不上诗的话,专门用毛笔写了送给他:“光照万里明世情,远非于公目邃深。长传聪学作孺牛,寿山福海唯求真。”

2009年,我得知他搬到阳光比较充足的新居,便去探访。新居里的摆设并不奢华,但有人为他新塑的雕像却十分显眼。那时他因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能力,听力也下降。我只得用小黑板写字,同他进行交流。他的语音由夫人老孟翻译。那一次我离开时,他让助手推着轮椅,送我到电梯门口。谁想这次竟是最后一次见面,虽然他住院时,我多次想去探望,都未如愿。

光远同志,您一路走好!

说起来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,可是我忘不了。当时我的孙子进了威海路幼儿园,每天早晚是他亲爱的外祖母好亲婆接送。碰到好亲婆有事,我就代劳。

有一次我下午四点多钟去接孙子。放学前一分钟,幼儿园大门打开,让接孩子的家长进去。幼儿园里有一块大草地,有许多石凳,我找了一张石凳坐下。接着来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,坐在我旁边。她神态庄重,衣冠楚楚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一看便知道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。很快我们就谈起来,于是我知道她是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。“您是来接孙子的?”我问她。“不,”她回答说,“应该说我是来看孙子的,还带点东西给他。”她把身边一个老式多层饭盒提起来给我看看。“每天他放学,我就来看看他。”

奶奶和孙子

任溶溶

于是我明白了,她和孙子不住在一起,也就是说,她和儿子媳妇也不住在一起,孙子当然住在爸爸妈妈很快下课铃就响了。我孙子的那一班晚下课,教授的孙子倒来了。他是个白白胖胖的孩子,真可爱。一位保姆跟他一起来。保姆来接他,在教室门口等着,把他带来了。孩子来到他奶奶面前,叫了声奶奶就想走,可他奶奶拉住他。

“我给你带来东西,你吃了再走。”

“我很饱,刚吃过点心,”孩子只想离开。保姆留住他。“你奶奶好心好意把东西带来了,你就吃一点吧,让奶奶开开心心。”这时老太太已经端给孩子一碗鸡汤,汤里还有一只大鸡腿。“老太太,”保姆又对老太太说,“以后您也别费心了,小少爷在家里吃得很好。”

孩子接过鸡汤,咕嘟咕嘟喝了汤,鸡腿没吃,把碗还给了奶奶,拉着保姆就走。保姆只好对老太太很有礼貌地说:“那我们先走了。”

老太太低头收拾餐具,对我说:“真不好意思,孙子的娘不欢迎我上她家,我只能到这里来看看孙子,给他吃点好的。”她收拾好东西跟我说声再见,慢慢地站起来,一步一步走了。

紧接着我的孙子奔来,放学了。我知道有些人家婆媳关系不好,却没想到会闹得这样僵,还拿孙辈来闹事,真是太叫人难过了。

我实在不愿意记下这样不愉快的事,却又忘不了。不过事隔那么久,我的孙子如今已经是成年人,工作了,那个孩子应该也差不多。他长大了,一定明白道理,会对奶奶好,对妈妈好,会想起他小时候,她们是多么爱他!当然,我更希望每个家庭和睦和睦,没有这样紧张的婆媳关系!

劝告的难处

周炳榛

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100对夫妻,做了多项专题研究。发现在婚后的前七年,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都反感对方多提出劝告,认为多提不如少提,多提反而影响婚姻生活,而影响婚姻最甚的,是那些对方不想要的劝告。

另一个发现是:在没有任何劝告时,受害的一方往往是丈夫,因为通常情况下,丈夫获得支持和鼓励的途径主要来自妻子,而妻子则除了丈夫以外,还从朋友、闺蜜等处得到帮助。妻子和丈夫在接受劝告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情绪:对于妻子提出的劝告,丈夫常解读为责备、唠叨不休;而丈夫提出的劝告通常伴有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、方案等,妻子会觉得自己被瞧不起,被视为无能等。

夫妻之间太知己知彼了,所以好意的劝告经常被视作故意找茬。一方自以为知道对方需要什么、应该做什么,径直提出劝告,而忽视了对方此时此刻的情绪、需要得到帮助时脆弱的心里,效果往往适得其反。所以,要给出一个合适的劝告,首先要弄清楚配偶是否真的需要它,耐心倾听对方诉说是最重要的,让配偶把事情说完,有时候,配偶在诉说过程中也会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。所以,有人认为在夫妻之间,耐心倾听比给予劝告更为有效。

劝告还要讲究技巧,有一种所谓“迂回包抄”战术,就是先和配偶的母亲沟通,由其母亲向配偶提出劝告,可能会事半功倍;劝告的时间段也很重要,在吃晚饭前提劝告效果最差,因为大家都饿着。

人行十年有余,时间过得不知不觉,甚至常有加速之感,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,新闻媒体与社会共生共长,新闻的力量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的变化,而社会变化也在改变媒体的表达方式。如今回想起来,居然还会有些悠悠的想念,想念那种吃萝卜干饭的苦,以及苦之后的收获。所以,有一种新闻的力量,叫成长。



月夜 (版画) 林世荣

之后去了采访部,我负责的内容之一是交警。其时正值上海“排堵保畅”,常常一早就出门和交警一起站路口,一口口地呼吸尾气,一点点地感觉头晕加剧。除了这些,作为机动记者,上海两会、全国两会、事故现场,都是我的“战场”。再后来,得益于频道的改革措施,记者也有机会走上主舞台,我白天跑新闻,晚上主持《东视夜新闻》直播,每天只是觉得睡不够。除了上班,还要照顾生病的家人,记忆最深的,总是下班路上的疲惫,在公交车上困得东倒西歪,坐在位置上,不可遏制地打盹,却又一次次在头撞到车窗时醒来。那时要问我新闻的力量是什么,我的回答一定是:拼搏。

成长 拼搏 信念

何婕

七年前,上海三家电视台的新闻中心合并,巨大的团队放大了报道的能量。相同的是,我们仍然关注城市发展,不同的是,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,视野更宽。突发灾难、重大事件、日常报道,新闻团队用速度、深度、温度进行全方位的阐释,架起了观众了解世界的桥梁。

2011年3月11日,日本发生大地震,我在直播前20分钟接到要上直播的指令。多年来直播已成家常便饭,但对这场还是记忆深刻。上台时,我没有任何稿

英国电影《献给爱妻的歌》是一首老人之歌,在人生的黄昏,在生命的冬季,原本看见的,应该是西沉的落日,是凋零的老树,还有一点无奈和压抑。但看完这部电影,绝不会让你产生悲伤、悲观的情绪,在落日里,你看到了斑斓,在老树里,你看到了生机。这是一部让你重新审视生命的电影。

《献给爱妻的歌》是我看过的老年题材电影中最为特别的一部:在英国的小镇,有一个老年合唱队“夕阳红”,玛丽安身患绝症,来日无多,却在那里找到了生命最后意义;她的丈夫亚瑟,原本反对玛丽安唱歌,但在玛丽安去世后,他改变了态度,为合唱队筹集下汗马功劳。没有哈内克《爱》那样残酷:为爱闷死生病的老妻;也没有《涉外大酒店》那样复杂:一场旅行串联起多人的生命历程;但这部电影,却有音乐,有歌声,所有跳动的乐符,穿行在镜头里、画面间,音乐让一切变得饱满。

合唱队中唯一的年轻人是伊丽莎白,别小看这个角色,这是这部电影的支撑点、基础、枢纽。一个小学里的音乐老师,业余时间创建这支合唱队,为老人参加比赛指挥、排练,没有报酬,还被约会的男人甩掉,问她目的何在,图的是啥,回答简单:那么多人微笑地听我说话,我很开心,也很享受。她是玛丽安唱歌坚定的支持者,又是亚瑟卸去生活重负的引导者。在这个白发世界里,她是活泼的清泉,是树上的花朵,是生命的女神,是激情的催化剂,也是希望的发源地。

伊丽莎白为合唱队选取的歌曲令人发矍,不是适合老年人的高雅艺术歌曲,不是舒缓的小夜曲,而是重金属摇滚、嘻哈、说唱。贝司、打鼓、僵硬的机械舞、愤怒、性感、狂野,所有年轻人迸发力量、能量的一切因素,都成为老年合唱队的标记,这是导演的匠心独运,老年人的身体,青年人的表现形式,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对比更强烈呢?当它们融合为一,一定会产生喜剧化的效果。

这部音乐片,本质上是关于一对老夫妻的,他们几十年的生活,有过磕磕绊绊,这是显而易见的,但电影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些,它用最感人的影像和歌声,要让我们知道,陪伴几十年的夫妻,哪怕一个辞别人世,另一个还要带着爱独自上路。“我们都是未竟之歌,等待着人生最好的一段”。玛丽安在生命最后的关头,让音乐成了寄托,也让自己的歌声完成了对丈夫亚瑟爱的全部表达,一曲《真的色彩》,当着那么多人的面,用全部生命的能量唱出:“你悲伤的眼神,不要难过,如果这世界让你疯狂,就告诉我,因为我会陪你。我看见你真正的色彩在闪闪发光。看见你真正的色彩,所以我爱你。你真正的色彩,美丽动人,好像彩虹。”而亚瑟在合唱队业已淘汰的境地中,硬是带领“夕阳红”,用一曲《晚安,我的天使》,唱出对爱妻的思念,赢得观众和评委的心,最终获得第三名。“晚安,我的天使,该闭上双眼,无论你去何方,我不会走远。记得你为我唱的那些歌,当我们扬帆远航在碧绿海天,我拥你入眠。有一天我们总要离开,但摇滚曲会继续,它们永不消亡,就像你和我一样。”看多了这种类型的电影,原以为,我的心不会起涟漪,但在歌声响起,掌声响起,画面静止在舞台的那一刻,我的情感终于掀起阵阵波涛。毫无疑问,电影击中了我。

罗氏训子

美芳子

南宋诗人杨万里,妻罗氏七十多岁了,寒冬腊月,黎明即起,亲至厨房煮一锅粥让奴婢们吃饱,然后安排劳作。其子杨东山对母亲说:“天寒何自苦如此?”母亲说:“奴婢亦人子啊,清晨寒冷,使其腹胸有暖气,乃堪服役耳。”东山说:“母亲老了,且贱事,何必倒行逆施乎?”其母怒斥道:“我做得很高兴,岂知寒冷?汝出此言,一定不会像我这样做的!”据记载,东山任吴郡太守,八十多岁的罗氏还在郡圃里种学为衣,其节俭如此。

杨东山是一位清官,显然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的。罗氏身教言传,无非让儿子知道,治家与施政同理,当官的更要懂得官民平等,善待百姓,体恤下情。



十日谈

跳出鱼缸的金鱼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